

内部刊物
注意保存

青运史研究资料

(12)

中央团校青运史研究室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二十日

目 录

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之部)

报告第一号 周恩来 (1)

关于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特殊职务议案 (7)

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提向国内

大会的三个建议案 (8)

内部刊物
注意保存

青运史研究资料

(12)

中央团校青运史研究室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二十日

目 录

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之部)

， 报告第一号 周恩来 (1)

关于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特殊职务议案 (7)

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提向国内

大会的三个建议案 (8)

李维汉同志回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旅欧之部 (9)

蔡畅同志谈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四年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法支部情况 (10)

傅钟同志谈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四年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法支部情况 (12)

有关共青团旅欧之部问题

的访问记录 (13)

关于“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

几个问题的商榷 王永祥 (16)

回忆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南宁的斗争 莫文骅 (22)

前仆后继 刘志坚 (27)

党——青年的母亲 陈 模 (30)

青运史研究动态两则 (6, 35)

《青运史研究资料》一九八〇年目录索引 (36)

“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之部)

报 告 第 一 号

(一九二三年三月十三日)

周 恩 来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中央执行委员会诸同志，

我们旅欧共产主义少年团体在去年十一月二十日曾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名义与同志们去过一封公信，诚恳地声明：我们愿附属于国内青年团，为其旅欧之部，同时并向团中建议三事。此信当由同志李维汉（罗迈）携带回国，并委他为旅欧少共的代表，向团中正式接洽，计时当已达到。

罗迈行后我们在此静待好长期中，忽得到中国赴“共产国际”和“少年共产国际”的代表已抵赤都的消息，由不得我们不立即去信表示我们诚恳的敬意，同时并切实声明我们此间团体加入国内青年团一案亦已正式提向国内毫无犹疑。其后代表团由老辅同志复我们一信，希望我们“旅欧少年共产党”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之部”，在此名称

组织之下而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应改为“执行委员会”；同时并指示我们对于团中纲领的误解和在欧行动的方略。我们在今年一月得着这封信后，益觉我们团体的名称组织有急于改换的必要，于是乃有多数同志提议不待国内信至即实行改组，立即归属国内本团，以明我们去年六月大会组织旅欧少共团体的始衷，执行委员会因此更进一步于二月间召开临时代表大会，实行改组。会期自二月十七日至二十日，地点在巴黎郊外。会议内容，报告，演说后，第一案即为：依据去年十月总投票结果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遵守其纲领并章程上重要原则，以确定本团体在欧之名称与组织。我们当即依此议定了我们旅欧之部的名称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随即遵守国内本团章程上重要原则，依据我们旅欧特殊任务，议定旅欧之部的章程（原文见附件一），明白规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本团上级机关”。至于旧日托罗迈同志带回国的三个提议，名称说已不成问题，纲领修改更由此次大会自动地决议撤销了。章程旧提者已多不适于用，现此新定者乃为我们正式向中央提出请求认可的现行条文。同志们，这便是我们旅欧少年同志依着共产主义的纪律向你们表示极诚恳的归依。我们更坚信你们必能欣然承诺，来指示我们旅欧的行动方略，——在我们看，这实是毫无疑义的。

在此次大会中，我们讨论的事件非常之多，详细的报告，不久将誉印有团务报告出来，此处不及详写，止先写个大概如下。

1. 旅欧青年团的团员在开大会时总数已达七十二人，到会的代表为四十二人，全体人数分配为：旅法五十八人，旅德八人，旅比六人。

2.开会时同志赵世炎为主席，同志任卓宣，薛世纶，赵光宸，穆清四人为记录，四日大会均如此未变。

3.通过案件约二十项，重要的为：

一、改组案——决定名称，议定章程（详情见前，不及）。

二、本团旅欧之责任及今后应有之活动——大体规定为共产主义的教育工作，换言之，即是列宁所谓“学”“学共产主义”。

三、学生运动问题——主张维持勤工学生的总团结，同志们活动须量力而为，特别注意于宣传主义吸收同志。

四、华工运动问题——决定维护现在我们同志所主持的“华工总会”，实力援助华工旬报——工会机关报——努力图华工教育实现，以便吸收同志。

五、内部训练问题——以进行共产主义研究会为最要之事。

六、《少年》出版问题——因留法勤工俭学生界中有无政府主义出版物《工余》杂志和基督教《青年会星期报》的猖狂惑众，足为我们宣传障碍，另一方我们少年团体在此实有为第三国际和国内共党解释战略并传播共产主义学理于不甚能读外国文主义书报之勤工生和华工中之必要，于是乃仍决定继出《少年》月刊。

七、经济问题——每个团员月担任十二方月费。

八、通过撤销前向国内中央希望修改名称改正纲领的两个提议（本来我们对于纲领内容怀疑之处早已打消了，此不过作一番形式上的撤销而已）。

九、请议决以后本团团员有加入各所在国共产党者，必须得本团执行委员会之许可案——议交新执行委员会审议。

十、请开除张伯简（红鸿）案——此为不服旧执行委员

会警告红鸿决议提向大会之抗议，但结果仍被否决，接受执行委员会警告原议。

十一、弹劾张申府案——在大会中旅柏林同志们的代表伍豪（周恩来）声言因大会①及执行委员会②仍认R（张申府）为团员，而R在柏林地方会确已屡次声明退出少共，伍豪自己亦曾向中央报告过他持不同态度，因此无法为大会仍为团员的R做代表。因此遂有团员提议成立弹劾案。继追究R为何在地方会声明退出少共，乃推论到年前执行委员会因其于弹劾红鸿案罗织罪状过甚，且有胁迫中央之言与以劝告，R不接受。嗣经执行委员会多次讨论，将此案不再追究，惟R仍不满意，辞“共产主义研究会”书记，置执行委员会不理，最后至大会始更发现其又有退出少年之声言。准此情形，大会认定R在少共团体中实处处违反共产主义的纪律，乃决议将R除名于少共团体之外。惟R本为中国共党党员，此种决议如何，实有报告中央请转达中国共党之必要，因此我们对于此事仍将有详细报告寄上，此处祇不过先说个大概。

十二、弹劾旧中央执行委员乐生（赵世炎）雷音（王若飞）伍豪（周恩来）石人（尹宽）林木（陈延年）案——准上项情形，大会当认旧执行委员五人处理R事过于懦弱疏忽，决议成立警告案。

4.选举新执行委员五人：捉掀（任卓宣），伍豪（周恩来），石人（尹宽），裸体（汪泽楷），觉奴（萧朴生）当选。候补委员三人：大冶（刘伯坚），戈般（王凌汉），钟声（袁子贞）当选。

① 大会认旅欧少共全体人数为七十二人，申府确在此数之内。

② 前执行委员会总书记乐生报告执行委员会永未接柏林地方会书记报告他R退出少共团体，且其报告信中更常言张申府出席发言建议，却未道及他退出少共事，直至此次大会，伍豪替柏林地方会廖焕星向大会报告柏林地方会事务，方始说出。

大会过后，执行委员会立即组成，推选伍豪为书记，石人主任“共产主义研究会”事，裸体主任“学生运动委员会”事，觉奴主任“华工运动委员会”事，捉掀主任“出版委员会”事，并依大会一切决议，循序进行。本此，我们先写此第一封报告信寄上，至其他进行事项，与中央希望我们在欧期中应有之外方报告，自当陆续报告无误，兹先在此声明一下。

又本团旅欧团员在开大会时数目为七十二人，其中除^R已为大会除名外，余七十一人中，有同志刘清扬亦已准备回国，同志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余立亚，高风，陈九鼎，王凌汉，郑超麟，袁庆云，王圭，熊雄十二人已预备起程赴俄入东方劳大读书；除最后三人外，余人均入德事稍有阻碍，现正多方设法，想不久当可成行。

再我们要慎重声明的，在我们此次大会将开会前，我们得到中央一月二日寄我们的信件，希望我们依中央第十次会议议决国外组的办法加入青年团，我们当时因为我们正式代表亦已派回国去接洽加入事件，到莫的中国代表团又曾和我们表示过前述的改组希望，而我们自己又正在自动地召开改组的大会，于是我们乃在大会中诚恳地接受了你们希望我们的好意，而实行改组成上述的组织，附依于你们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之部”同志们，这个办法，我们想你们一定予以谅解！

巧了在我们这封信尚未写完之时，我们竟得着一月二十九日中央许可我们加入的公信，我们看着后真欣喜无量！我们现在已正式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旅欧成员了，我们已立在共产主义的统一旗帜之下，我们是何其荣幸？你们

希望我们“为本团勇敢忠实的战士”，我们谨代表旅欧全体团员回说“我们愿努力毋违！”至中央命我们更改章程的六项和停刊《少年》的事，在纪律上我们当然是接受无疑，一俟执行委员会全体（我们现时止〔只〕有三人在巴得见此信，余二人尚在他地）观齐后，便当正式答复，迟缓处，尚望原谅！

专此，同志们，愿接受我们的敬礼！

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执行委员会书记 伍 豪

（于巴黎）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一）第400—405页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选编

宁都县青运史工作取得成果

宁都县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是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之一，也是当时中共江西省委、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在党的领导下，宁都县青年运动，有着光荣的斗争历史和优良的革命传统。为了更好地研究青年运动的历史经验，掌握青年工作的规律，用前辈青年的斗争历史教育广大青少年，在上级团委和中共宁都县委的直接领导和亲切关怀下，共青团宁都县委从今年一月起，抽调四位同志，成立宁都县青运史编写组，发动全县各级团组织一齐动手，认真开展了本县青运史料的收集、调查、研究工作。

到十一月份止，青运史编写组先后在本县和外地进行了一百九十一人次的调查访问，取得了十九万字的第一手材料，查阅了约八十万字的历史档案资料，从中摘抄复制了十万字的依据史料。在此基础上，现已编写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宁都县共青团、少先队、儿童团组织大事记，二个重点区（乡）苏区青少年斗争情况的调查报告，一位苏区老团干的回忆录，二位青（少）年烈士的传略，并汇编成《宁都县青年运动概况》一书，约七万五千字。

最近，共青团宁都县委配合青少年教育工作，行文将此书下发给各公社团委、县直属各单位团总支（支部），要求全县各级团组织充分运用本县青年运动的宝贵史实，在全县青少年中认真开展好革命传统教育，宣传学习团队组织的光荣历史和前辈革命青年的英勇事迹，激励广大青少年继承和发扬青年运动的光荣传统，为四化贡献青春。

共青团宁都县委宣传部 彭战雄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十七日

关于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特殊职务议案

我们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既已为国内青年团承认的旅欧部，我们的特殊职务实有请求大会决定之必要；因此，我们乃拟出下列草案提出大会，候公决。

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旅欧部。这个团体在欧洲集合了许多中国青年工人和学生投身于共产主义旗帜之下，来学习一切。他们的职务，除去青年团中应做而为他所能做的职务外，他更有特殊职务可言。接触欧洲的共产主义实际运动，考察学习并介绍其活动方法，这是旅欧青年团的第一使命。其次，旅欧的勤工俭学生和华工朋友，乃我们认为立在同一被压制境遇下为人，且更多无产阶级的少年在内。我们的利益，本是除掉无产阶级少年全体的利益无其他利益可言的；因此，旅欧青年团在勤工俭学生和工友运动中的一切参加，也是本着他的职务来为无产阶级少年谋全体利益。在这种活动中，旅欧青年团员应以宣传吸收同志为最要目的。此外，旅欧青年团为要清除旅欧中国无产阶级少年解放运动的障碍起见，他实应努力反对惑人思想的宗教（最显著的是天主基督两教）和其所属一切组织（云鸣远属下的教会学校和基督教青年会等等），更应努力反对与无产阶级少年利益整个相反的中法教育组织（例如里昂中法学院）：这两事实是旅欧青年团附带的使命。

总上述全部职务，简言之，便是一个共产主义的教育工作，也可用列宁的话说：“学，学共产主义！”

（《先驱》第24号1923年8月1日出版）

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提向国内大会的三个建议案

1. 青年团与共产党的从属关系宜明定出条文，理由是：

A、历考国内年来的 S.Y. 运动，多因党与团的关系未明定出，致闹出许多青年团员公开地作出反对党的首领或不满意于党的文字的笑话；

B、党与团的从属关系未明定出，于是党的政治行动常常不能使全体团员了解而接受；

C、青年团员因不明党与团的关系，于是乃常有因团中央执行委员会接近党的首领接受党的决议之故而深滋疑虑。

因此，我们乃主张与其为避忌党的公开而使青年团有态度不明分子复杂之虞。莫如明定条文，以祛此弊。

2. 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必须由党选派青年党员二人为其执行委员，法国青年团的组织便是如此。我们为欲使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团明白地表现其从属和密切的关系起见，必须采用此法，至区执行委员会亦可斟酌情形，施此同样方法。

3. 青年团的内部教育工作，其在训练，严格纪律，强制服务，实有着意施行之必要。旅俄中国青年共产团之各地宜组织检查部的提议，如蒙大会采纳，我们便更进一步主张各地检查部的组织宜有过半数委员由党指派，因非如此，不足以将纪律讲到好处。

（《先驱》第24号1923年8月1日出版）

李维汉同志回忆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之部

这次运动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在勤工俭学中建立一个严格的战斗的共产主义组织的必要性。

周恩来同志于一九二〇年底也到法国勤工俭学。他和勤工俭学生有着广泛的联系。我们当时还不认识他。事后才知道他对两次斗争甚为关注。他考察了运动的情况，写了很详细的报导寄给天津《益世报》发表。越到后来，报导的倾向性越鲜明，代表了勤工俭学生的呼声。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期间，他自日本回国，领导了天津的五四运动。他领导的“觉悟社”，已与李大钊同志和北大的先进分子有联系。一九二〇年，他在斗争实践中热情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赴法后，曾到英国伦敦一个短时期。一九二一年他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一九二一年底或一九二二年初，我收到恩来、世炎托人转来的信，约我到巴黎一个旅馆会面，商组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事。我们商定分头筹备。在筹备期间，我曾反映尹宽、薛世伦等人的意见，提出工学世界社全体社员参加的建议。另有人建议，有关的进步组织可由代表参加。这两种建议都是幼稚性的表现，既与原则不合，也与实际不符。经过酝酿讨论，双方都放弃了。约在一九二二年六月，我们在巴黎近郊森林里集会，宣告旅欧少年共产党正式成立，世炎任书记，恩来负责宣传，我负责组织。各用一个代号，叫乐生、伍豪、罗迈。党部设在巴

黎意大利路哥特伏化街十七号一个旅馆里，经常在那里工作的有赵世炎、李维汉和陈延年，从工厂接受逃云母片的工作，维持生活。陈延年和陈乔年兄弟原来信仰无政府主义，延年还负责编辑过《工余》杂志。经世炎等的工作，我记得先是乔年后是延年陆续参加了少年共产党。延年参加了少年共产党的领导核心，编辑机关刊《少年》。他俩抛弃无政府主义信仰之后，成了很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后来都反对陈独秀主义，一九二七年上海“四一二”政变后，先后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若飞在蒙达尼胶鞋厂工作时，和我多次在运河岸上散步并畅谈。他告诉我，欧战前信仰过俾斯麦主义，欧战后改信威尔逊主义，最后转而信仰马克思主义。他曾积极从事华工运动。在进占里昂大学的斗争中，他是领导者之一。少年共产党成立后，他也是领导核心的成员。

一九二二年下半年，在党中央工作的蔡和森来信，要我回国工作。我受旅欧少年共产党的委托，带信给中央，请求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路费是恩来和世炎为我筹集的。我于一九二二年底或一九二三年一月初到了北京，向党中央报到。党中央在一次会议上，批准旅欧少年共产党改名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由中央另给指示。我则由毛主席和蔡和森介绍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派回湖南工作。回湖南前曾给世炎、恩来去信告知结果，以后就再未同旅法组织发

生联系。

当时已回国的新民学会会员和工学世界社社员都已加入了党或团的组织，参加了实际工作。留在法国的会员、社员后来也有不少人加入了党团组织，在旅欧党、团组织领导下从事学习和工作，并大都经过去莫斯科学习，然后回国。新民学会和工学世界社至此最后也结束了它们的活动。

周恩来、赵世炎是中共旅欧组织的创立者。我回国后不久，恩来和世炎等在法国、比利时和德国分别建立了党的支部，后联合成立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恩来在一九二四年回国以前，一直领导旅欧总支部的工作。这期间，党员和团员都有不少发展，许多团员加入了党。我们党的老一辈党员中，已经去世或牺牲的朱德、李富春、王若飞、

陈延年、陈乔年、刘伯坚、张伯简、林蔚、郭隆真、余立亚、熊雄、熊锐、孙炳文、穆青、欧阳钦、李林、李蔚农、王人达、张增益、任理、肖朴生、袁子贞、马志远、资道焜、陈彭年、李大章、邢西萍、陈微明、谢唯进、何以瑞、史逸、林修杰、高风、李季达、陈声煜、冉钧、黄士韬、杨志华、帅立木、范一，以及现在还在工作的邓小平、聂荣臻、蔡畅、傅钟、何长工、李卓然、江泽民、刘鼎同志等*，都是在旅欧支部参加党的。

* 这是一个初步查明的很不完全的名单，还可能错误，待以后查实改正。

（节选自李维汉《回忆新民学会》，见《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九辑第27页）

蔡畅同志谈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四年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法支部情况

（一九五七年三月）

新民学会与留法勤工俭学会是毛主席首倡，蔡和森参加的。民国七年（一九一八年），新民学会在我家里开成立会，不久，毛主席、蔡和森就到北京，发起了留法勤工俭学会。留法勤工俭学会预备班设在保定育德学校，李富春入过这班读法文，然后到法国做工，挣得钱后再学习。

“五四”运动以后，受了新思潮的影响，青年中的爱国热情高涨，但北洋军阀腐败无能，学生毕业即失业，当时大家认为到法国去是一条出路。新民学会和留法勤工俭

学会是当时青年中最进步的团体，把一些革命穷学生和失学的学生组织起来。

我和母亲是一九一九年十月离开长沙到上海，蔡和森十一月离长沙到上海，十二月一起到法国去的。去法国，在国内得到毛主席的帮助和支持。上海到巴黎的旅费，由上海男青年会交涉买邮船五等舱的票（五等舱是载牲口饲料的，约需一百元，较便宜）。在出国以前，大家以为到了法国一切都会好的，但到了法国却找不到工作。李石曾、吴稚晖等人在巴黎组织华法教育会（该会与法

政府有联系)。我们到了巴黎先找华法教育会。华法教育会地方很小,容纳不下那么多人,只好搭棚睡地下。华法教育会曾想办法到巴黎附近学校寄住,蒙丹尼男子中学和女子中学是吃、用都比较少的学校,一学期约需二百法郎。那时没有家属亲友帮助的穷学生(毛主席称为“穷措大”),想做工又找不到,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李石曾、吴稚晖等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想网罗一批青年,凡有可能工作的地方,他们首先通知那些与他们思想接近的人。而毛主席影响下的青年,就和他们斗争。越穷的学生就越看不起无政府主义者。蔡和森在巴黎附近蒙丹尼发起的“工学世界社”,提倡工读。

一九二〇年二月八日,留法的勤工俭学生在巴黎举行了一次“二八”游行示威运动。这个运动是反对中国驻法国的公使馆不管留学生的生活与学习等问题,提出了三权的口号:要劳动权、读书权、面包权。运动的领导人是:周恩来、蔡和森、王若飞、陈延年等,有好多人都参加。我们二十多个女同志排在队伍的前头,攻公使馆时打先锋。结果公使馆被打进去了,二十多个女同志关进了监狱。游行队伍后来给警察冲散,李石曾出面说好话。经过这次运动,留法勤工俭学生中开始分化:马克思主义者即是以新民学会为基础的那些穷学生;国民党的左派我们也联络上了;另一部分华工对政府不满,也开始同情我们了;剩下的就是无政府主义者了。

勤工俭学生分化之后,驻法中国政府当局和李石曾用解决勤工俭学生问题的名义,发起了一个募捐运动,准备在里昂办一个中法大学。经过“二八”运动,留学生有的回华法教育会,有的又回到蒙丹尼男子中学和女子中学。蔡和森在学校进行共产主义宣

传,常常有开会、讲演、交换意见等活动。蔡和森曾在蒙丹尼开过一次大会,讨论怎样救中国。那次会陈延年、李立三、李富春等都参加了。会上“无政府主义救中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等“富国强兵”的道路全都提出来了,但是蔡和森认为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是救中国的唯一出路。这次会对留法学生影响很大。

一九二一年十月,继“二八”运动之后,又发起了一个“占领中法大学”的运动。原因是中法大学成立之后,准许入学的都是李石曾从国内另招的一批留学生,驻法的中国当局推这事是华法教育会的事,而华法教育会又推是法政府的事。

当时占领中法大学的有一百一十人,蔡和森等就是这次运动之后,被法国政府押送回国的。当时押送回国的还有陈毅、李立三等一百零四个人。从此,留法勤工俭学生中思想上更加分化,这就是一九二一年底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历史背景。几次革命失败,青年中发生大分化,赵世炎、周恩来、王若飞、陈延年、刘伯坚、聂荣臻等发起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原叫S·Y·,后叫C·Y·,经上海党中央批准,后改为中共旅欧支部。建团时间是在一九二一年底或一九二二年春,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可问问周总理。蔡和森回到上海后才入党的,所以发起人没有他。

我是在里昂加入团的,时间是一九二二年春夏之间,不久就由里昂到了巴黎。李富春不是团的发起人,是两次运动的积极分子。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第一任书记是赵世炎,第二任是陈延年,第三任是周恩来。《少年》刊物是轮流编辑,邓小平、李畅英刻蜡板,李富春发行。《少年》是法文字La Jeunesse,应译为“青年”,后来该

刊改名为《赤光》，有时是三日刊、二日刊、月刊，时间不定。《少年》社址在巴黎意大利广场，G·S·街五号，一个咖啡店的楼上，我在一九四八年还去过一次。

邓小平、李富春是白天做工，晚上搞党的工作，而周恩来则全部脱产。我和李富春、聂荣臻等在一九二四年到苏联，因那时转入地下，有一部分送莫斯科学习，另一部分回国。我记得离开巴黎的头一天晚上，警察来检查，我们告诉他说明到柏林去，警察便走了。

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有好几百人。团支部改为党支部时，我领导一个学习小组，白天做工，晚上做支部工作。旅欧党支部与法国党有联系。党支部的发展对象是勤工俭学生和华工。巴黎附近的边古有很多华

工（北洋军阀当猪仔卖去的），于是在那里组织俱乐部、工会、补习学校等，另外还和国民党左派做统一战线的工作，反对李璜、曾琦，他们是俭学生，是醒狮派。

蔡和森在法国时，很用功，看《人道报》时，一个字一个字查字典，再看小册子，然后再看原著。一九三一年他在两广工作，六月五日在香港被捕，是叛徒出卖的，后来引渡到广州。被钉在十字架上活活打死的。敌人逼供时，他只肯说：“我是共产党员。”一九三二年我由上海到瑞金，路过香港，曾想打听他牺牲的时间（是一九三一年，还是一九三二年不清楚），但打听不出更详细的情形。

（罗征敬整理）

傅钟同志谈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四年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法支部情况

（一九五七年春）

一九二一年，在法国成立了“少年共产党”。那时完全模仿俄国的一套，“少年共产党”内还有人提议设立一个管军事的委员会，因俄国党有这么一个机构。当时所以叫“少年共产党”，我想可能是因为那时大家都年轻。

“少年共产党”成立后不叫支部，而是称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国内建立了党的组织并与巴黎取得联系后，陈独秀曾来信说：国内已成立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党不能有两个，你们最好加入法国共产党为一个支部，或者改名为S·Y·。陈独秀寄来的信，世炎一九二二年在波罗涅召开代表会时曾拿

出来念过，后才改为S·Y·。

S·Y·成立后，曾办一油印刊物——《少年》周刊。《少年》出版一年左右，改名为《赤光》。

《少年》的编辑工作由世炎负责，写钢版主要由陈延年负责，因他做工少些，陈延年下班后也经常帮帮忙。《少年》刊物当时并没有一个“编辑委员会”。恩来同志常为《少年》写稿，我记得第二期上曾发表过恩来同志的文章，柏林那边可能由他负责组稿。

《赤光》也可以说是S·Y·的刊物，版本和当时国内出版的《中国青年》一样大。经

常负责 S·Y·工作的有两人（脱产），同时由他们二人负责刊物的编辑出版。小平、富春、畅英和我都搞过《赤光》的编辑出版工作。《少年》发行的数量比较少，好像是对内的刊物，《赤光》是公开大量发行的，战斗性也更强了，与国家主义等非共产主义派别开展了斗争。《赤光》给国内寄的也不少，记得恽代英、萧楚女他们在《中国青年》上还写过介绍《赤光》的文章。

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更确切的翻译应为旅欧区委员会，因为当时法国有支部，比国德国也都有支部），第一任书记为赵世炎，之后陈延年干了不久，后来是恩来、刘伯坚、周维桢（一九二三年担任书记半年左右），李富春、萧朴生、小平、李畅英（李大章）也作过团的工作。我在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五年之间任书记，小平任委

员。我们那一届支委会报告工作时，约有团员四百人左右，以后发展到五、六百人。

S·Y·一直未取消（在法国），但同时也有党。当时我们很机械，吸收入党者首先必定要是团员，所以有一次苏联同志笑我们有三十几岁的团员（是一华工）。

一九二二年在巴黎波罗涅召开代表会时，面对国家主义的斗争更加开展了，与俄国和国内的联系也更加密切了，所以说这次会很重要。当时恩来是从巴黎前来参加会议的。

S·Y·虽然当时叫“青年团”，但并不是一群娃娃乱搞，而事实上团担当了很大的责任，参加了严肃的斗争，在国际间宣传中国革命，联系国内的政治斗争，作了不少工作。

（徐承武整理）

有关共青团旅欧支部问题的访问记录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我们访问了具体协助赵世炎同志（赵世炎烈士的姐姐）搜集资料的同志。他们向我们提供了有关情况，给了一些资料。通过这次访问，发现有些说法和我们以前所得的资料有些出入。现将他们介绍的情况和资料整理如下：

一、一九二一年十月在法勤工俭学生进占里昂大学运动，是我国留法学生中早期的一次青年运动。里昂大学是吴稚晖以照顾勤工俭学为名，在国内捐了一大批款并取得庚子赔款的一部分在法建立的。但是学生从国内招收（多是官僚子弟），不招收在法勤工俭学生。在法勤工俭学生为了反对这一做法，争取招收他们入学，于一九二一年十月

在赵世炎、蔡和森、李立三等同志领导下，进占里昂大学，准备等国内学生来到之后再和他们联系，以争取他们的同情和支持。当时一共是一百零四人，法国当局把他们全部拘押，不久遣送回国。回国前他们得知消息，决定留赵世炎同志在法继续领导工作（因当时大部分骨干参加运动被押），由探监者利用探狱机会换了赵世炎同志出来。这运动算失败了，但一百零四人回国后大部成了革命领导骨干，推动了大革命。何长工同搜集赵世炎烈士的材料，故没有提供。但可以肯定还有活动，曾任团中央技术书记的张葆臣说，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间，他见过从旅欧支部寄到团中央的材料，这方面我

志说，这是坏事变成了好事。

二、对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之部的筹备经过、成立时间及成立后的一些重要活动，得到了较为可靠的材料。

它的筹备工作开始于一九二二年初，由赵世炎同志负责。〔赵已是党员，并且是中共中央驻巴黎通讯员。（廖焕星在“党史资料”中一文提及）〕，赵为此奔走于法国各地。赵在给陈公培（现为政协委员）的信中说：“欧洲方面准备成立一个‘青年团’。”

“我今天正在忙迫，明天‘五一’去巴黎，并拟去蒙达尼、里昂、准也儿等处绕一遍，完全为青年团事。……”当时蔡和森、李维汉等组织有“工学世界社”，李要以“工学世界社”名义加入（蔡已于进占里昂大学运动后被送回国），而赵不赞成，给陈公培信中说：“我意即在初步严格取人之意，要求他们取个人行动，……。”就是说要吸收优秀分子，后李等也同意了。

经过赵世炎等同志的筹备后，于一九二二年六月在法国巴黎召开了它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共有十八人（代表三十八个团员），其中有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据郑超麟（托派，在押）谈尚有袁庆云、王凌汉、刘伯坚、尹宽（托派，在押）等人〕。周恩来代表柏林，李维汉是工学世界社的，刘伯坚代表比利时。开会地点在巴黎西郊某森林的一个广场上，会议共开了三天，由赵主持，谈了筹备经过。讨论团的名称时周恩来同志提议定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这和赵给陈公培信中提的青年团相同，他们可能商量过），多数人反对，后定名为“中国少年共产党”（据傅钟同志讲定名为此的原因，一是有些人曾加入过“少年中国学会”，一是当时国际上的青年组织都用这个名称）。会议决定成立中央执行委员

会，负责人称总书记。最后进行了选举，由赵世炎任总书记，周恩来任宣传部长，张伯简任组织部长（因张仍在德国，由李维汉代理，后因张有言过其实的毛病，正式由李担任）。（以上情况多系郑超麟讲，他回忆较具体，如说开会时是向一老太婆借了十八张椅子，周恩来同志穿的是一件黄色大衣，看来尚可参考。他们介绍就用这个说法。）

在第一次代表大会后，陈独秀曾去信提出一个国家不能有两个党，因此于一九二二年十月又召开了一次代表大会，决定改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会后派李维汉同志回国汇报工作（据聂荣臻同志讲李回国即是参加团的代表大会）。

由于决定赵世炎同志去莫斯科学习，因此于一九二三年二月十七日至十九日召开了临时代表大会，这时团员已有七十二人。据郑超麟讲，到会代表约三十人，还有华工代表三人，开会地点在巴黎西郊一个小镇的警察分局礼堂内举行，这事是由袁庆云办的。会议根据国内指示，决定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名称定为“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之部）”（据傅钟同志讲用“之”还是“支”有过争论，后定为“之”，意即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的一部分，而不是支部），将“中央执行委员会”改为“执行委员会”，“总书记”改为“书记”。会议改选了领导人员，由周恩来任书记，熊雄任宣传，组织不知是谁。会后周恩来同志亲笔给国内写了一份详细报告。

旅欧之部曾出版“少年”杂志，后改为“赤光”。“少年”由赵世炎、陈延年负责的，陈延年刻腊版。“赤光”由邓小平、傅钟等同志负责。

旅欧之部以后的活动情况，因他们专门